

=====
文革博物馆通讯（八〇九）·华夏文摘增刊第九七七期（zk1502a）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CND）主办
=====

（二〇一五年二月二日出版）

本期目录

【往事非烟】	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	周景生
【不堪回首】	《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	梁伟清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四）	王友琴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
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往事非烟】

我亲历的科大人逆境相助

• 周景生 •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64级学生。）

1968年夏天，清华等高校武斗升级，7月底，北京市60多个工厂3万多名工人组成“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北京各大专院校，接管学校的领导权。来我们班的工宣队是两个人，一个牛师傅，一个小杨师傅。牛师傅大约四十岁，面由心生，一看就是一个憨厚善良的老实人。小杨师傅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姑娘，听说是车间的团支部书记。工宣队被派到高校，主要任务是制止武斗，但我们学校没有武斗，所以，两个师傅每天的事情就是召集全班同学开会和政治学习。同学们本来对政治学习就不感兴趣，再加上和彼此不熟悉的工人师傅在一起，政治学习的气氛十分沉闷，大多数的时间都是冷场。一天上午，冷场了很长时间后，牛师傅宣布休息一会儿。大家的神经一下子松弛下来，涂忠寿同学随即开了个玩笑：“大家放风十分钟。”没想到，这句话立刻被小杨师傅抓住了：“你说放风？那你是不是认为政治学习是坐监狱？”小杨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向工宣队的上级做了汇报，要当做政治事件来处理。但工宣队来调查的时候，我们班的同学都告诉他们，“放风”是我们之间平时经常开玩笑的词语，只是代表休息的意思。其实，在我们之间，真的不经常使用“放风”这个词。但是，在那个时候，所有的同学都坚持那么说。因为得不到同学的支持，再加上牛师傅对此事也不愿追究，这个事件最终不了了之，涂忠寿因此逃过一劫。

牛师傅这批人走后，又换了另一批人进来。来到我们班上的这个人，言谈粗俗，比牛师傅差了许多，一看就是北京城里吊儿郎当的那种人。比如，他每吃完饭，总要在同学面前摸着肚子说：“又混了个肚儿园。”我在北京长大，知道习惯使用这种语言的多是什么样的人，所以很看不起他。我们去小右营修路劳动，他也跟着去了。到了那里，我们都拼命干活，他却到处溜溜达达，一点活也不干。修路劳动中，最累但也是最有意思的是打夯。在唱夯歌的时候，大家互相调侃、想起什么唱什么，一点也不觉得累。一天，我在唱夯歌的时候，看到那个师傅就在我们附近转悠，就顺口唱到：“我们流大汗，师傅旁边站，什么都不干。”（每一个顿挫，都有同学呼应“唉嗨哟”。）那天下午，正好家里有事，我就回家了。等三天后我回来，孔晓军和顾大

立都告诉我，那个师傅对我唱的夯歌非常生气，说这是污蔑工人阶级，要整我。但同学们告诉他，夯歌都是开玩笑，不能当真。同学们还将了他一军，说如果他要认真这件事，大家都不都唱夯歌了，让他领唱，如果他不领唱，完不成劳动进度他要负责。此师傅看到同学们这个态度，再加上他也担心完不成劳动进度，这才偃旗息鼓。这样，在同学们的保护下，我也逃过了一劫。

一九六九年末和一九七零年，科大师生遭受了刻骨铭心的劫难，这就是科大的下迁安徽和随之而来的“一打三反”运动。

当时高校下迁，是打着战备疏散的旗号的，但是至今，人们对此仍旧存在着很大的疑问。如果是战备疏散，为什么中共的党政机关不疏散，为什么当时的领导工人阶级不疏散，却偏偏让当时最不值钱的老九们疏散？既然是疏散，为什么除了人员外，还要把大批沉重和珍贵的仪器设备也一起搬走？那些年，毛泽东及其党羽们正在拼命地鼓吹所谓的教育改革。毛泽东在他的“五·七”指示中说：“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在他们眼中，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需要改造的对象。为了实现毛泽东的设想，那些爪牙们千方百计地企图把城市的高校轰到农村、边疆或其它边远的地方去。他们的这些措施，遭到北京师生的抵制，因而迟迟不能得逞，而借战备疏散之名，行改造和惩罚知识分子之实，才是这次高校下迁最合理的解释。

下迁命令既下，科大像一个无头苍蝇，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找不到搬迁的地方。当时的高校和知识分子，都是不受欢迎的。接受搬迁的学校，被视为是地方的一个负担。科大领导先后在四川、河南、山东等地碰壁后，在向李先念汇报时，恰巧他的老部下李德生进来，李先念问李德生是否可以搬到安徽，李德生当即答应可以。于是，一所高校的大搬迁，就在事先没有任何酝酿、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在几分钟内决定了下来。科大在搬迁时，只知道要搬到安徽，没有人知道科大这个全国闻名的大学要搬到什么地方，连李德生也不知道搬迁的目的城市是哪。师生们像逃荒的难民，被暂时安置在安庆马山一所空旷的党校里。冬天的安庆，没有暖气，大家睡在地铺上，每人发一个小碳火炉，在瑟瑟的寒风中取暖。人不知去何处，同来的贵重的仪器设备更不知该运往何处，在堆放时常有损伤。所有这些状况，都反映了这个搬迁的决定是何等的轻率和不负责任。科大师生，对这样的决定表达了强烈的不满。安徽省革委会视这种不满为向他们领导权威的挑战，于是就使用他们的权力，借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之机，在科大掀起残酷的整人运动。这种整人运动，视人人可疑分子，人人被审查，人人过关，以此造成一种恐怖的气氛，来达到打击异己、树立个人权威的目的。这种手段，在共产党斗争中，如肃 AB 团中、延安整风、建国后各次政治运动，都是屡试不爽的不二法门。现在，他们又把它用来对付手无寸铁的科大师生们。他们首先把科大六个系从马山党校分别分配到白湖农场、马鞍山、铜陵等六个不同地方，向各系派出工宣队或军宣队，夺取各系的运动领导权，然后按照他们的部署搞运动。这样，我们近代物理系的几百名师生（含尚未毕业的 64、65 级学生），就被发送到原来是用来改造犯人的白湖农场。

运动开始时，各年级原来的班级全部打乱，重新分成四个排，每个排有一个解放军的排长领导一切。我们排的排长好像姓李，脸上有几颗麻子，就叫他麻排长吧。每个排又被分成几个班，每个班有十几个人，我被分到一排一班，和我在同一班的，还有原来同班的涂忠寿、陈荣山和其他班的季柏清、浦正言、付万征、胡望曙、曹杏弟等。分班后，规定每个人不许离开驻地，不许和不同班的人讲话。这种规定，是把我们当做犯人一样对待，是对人权的侵犯，在法治健全的国家，完全是犯罪行为；但在当时，在那个无产阶级专政和阶级斗争理论肆意横行的时代，他们做起来是那样的心安理得。（不知道现在“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是否仍旧被使用。掌握这个武器的阶级现在已经变成了中国最有产的阶级。）被隔离开后，每天每个人的主要事情

就是回忆并写出揭发材料。所谓揭发材料，就是你在何时何地与人说过什么不满甚至反对某些高层领导人的言论。那些解放军排长们，每天都要分析上交的材料。只要发现一点蛛丝马迹，他们就揪住不放。利用这些材料施压与材料有关的其他人，逼他们交出更多的东西。科大的学子，忧国忧民，思维敏锐，对文革的错误有深刻的认识。在这个运动之前，在相知同学之间，彼此经常交换对政局的看法，而这些真知灼见，当时均被认为是反动言论。那些解放军的排长们，尽管平均文化水平也就在初中上下，但整起人来却是驾轻就熟。对他们更为有利的，是他们手中掌握着学生毕业鉴定和分配工作的权力。当时是一九七零年的夏天，六四级的同学毕业时间已经延迟了一年，六五级同学也到了毕业时间。这些排长们就用以后毕业鉴定和分配工作的好坏对同学威胁和利诱，让我们揭发自己和熟悉的同学。一旦有的同学的所谓反动言论被他们得到，这些同学就被他们指定的其他同学监视起来，无论是去吃饭还是上厕所，都有人跟在后面。随着时间的推移，被监视的同学越来越多。我发现，孔晓军、徐乃庄、刘杰等我的好朋友，也都被后面跟上了监视者。我知道，也该轮到我了。

果然，麻排长找到我，让我交代自己的问题，同时要我揭发徐乃庄和孔晓军。从那天起，他每天都催着我要材料。有时，他似乎是善意地劝你：“只要把知道的都讲出来，你就没事了。”有时，他又会沉下脸来警告你：“如果别人讲了，而你又不讲，就要严肃处理你。这样，你的毕业鉴定和工作分配都会受影响，弄不好甚至不让你毕业。”听到这样的话，想到自己的前途，想到家中的期盼，心里的压力真的很大。安徽的七月天，又闷又热。每天被强迫窝在蚊帐里写交代材料，又背负着那样大的思想负担，日子非常难熬。我把想到的材料列在一个本子上，前前后后凑了大约50条，都是些不太关痛痒的事情，什么“学大寨不现代化”、“阿尔巴尼亚要钱”等等，以每天大约五条的速度交上去。那些我认为有“严重”问题的，我没有往上写，而只是放在脑子里。这些“严重”问题，是我死守的底线，尤其是别的同学的言论，良心告诉我，我是绝不能说出去的。现在我还能记得起其中一些这样的言论。比如，孔晓军曾对我说过，他父亲告诉他，庐山会议整彭德怀，参加会议的干部大多数想不通。这句话虽然不太“严重”，但我想这件事涉及到他的父亲，如果讲出来可能给他父亲带来麻烦，因此我不能讲。徐乃庄曾对我说过，他有个“恶毒”的想法，他希望“老头子”早点死，这样中国才有希望。我知道，这个材料，如果我讲出来，可能我自己会得到个“积极参加运动”之类的好鉴定，但对乃庄的打击一定是致命的，我绝对不能为自己的利益去出卖同学。但是，在巨大的思想压力下，对于像我这样从没有经受过这样严酷运动的年轻人，要坚持这样的底线，真的是太不容易了。不知运动要搞到哪年哪月，不知将来会有什么等着自己，不知像右派那样的命运会不会降到我的头上。那些重要的材料，不说出来，自己可能过不了关，说出来，怎么对得起同学和自己的良心。内心的矛盾和煎熬，使我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为了给我加压力，麻排长使用了很多办法。一天，他非常严肃地告诉我，有外单位来函表明我和北京的反革命分子有牵连。他一说，我就知道这事和我高中同学李增林有关。李增林在批判三家村时在他的学校里写了一张大字报，开头两句话是“千军万马讨毛贼，誓把反党黑店摧。”李出身不好，这个大字报被解释为谩骂红太阳，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李文革后被平反）。我曾和另外两个高中同学一起找他校的左派们辩论，想证明他是被冤枉的。那些左派们哪里会和你讲理，我们不但没有帮成他，这些左派们趁一打三反倒打一耙，反而来函说我和反革命分子有牵连。这件事，成了麻排长手里又一个加压砝码，使我增加了更大的压力。

就在这一天度日如年的时候，我听到了一个消息：再过几天，排里要对运动做结论。对运动做结论，这就意味着运动就要结束了。这个消息，让我看到了希望。为了鼓励自己坚持住底线，我在那个列问题的本子上写下了“15，16日排里要做结论了。还有最后五天了！”和“咬紧牙关!!!”的字样。中午吃饭时，我从上铺爬下时，把这个本子带了下来。涂忠寿在我的下铺，从地上捡起本子递给我时，看到了我写在上面的字。当时，我们俩都愣在了那里，半晌，谁都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老涂小声地说：“快把它撕了吧。让他们看见，你该倒霉了。”那

时已是运动末期，老涂如果把此事报告到排里，他肯定会得到一个好的毕业鉴定，也会给他到分配带来好处，但他没有这样做。在那时，他究竟想了些什么，我到现在也没有问过他，但我相信，他那时想到的，一定是对同学的热爱、同情、信任以及保护同学的愿望。

由于担心撕掉那页纸反而会引起注意，我偷偷地把它揉成团，藏在口袋里，以后又鬼使神差地保存了下来。我把它粘在日记里，永远记住那艰难的岁月和同学的情谊。这页纸也给科大那段历史留下个见证。

我终于坚持到了最后，守住了底线，没有出卖同学，没有出卖自己的良心。我也感谢老涂，是他在那个关键的时候帮助了我。我相信，在我们科大，像这样在危难时同学相帮之事，一定是非常多的。例如，张之欧同学在给我的邮件中写道：“白湖那段生活可以说给我们每个人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它警示历史不可重演！当时他们对陈健、潘高建整得最凶，我因为常与老潘饭后散步、聊天也遭到非法监禁，但是关于老潘，他们休想从我嘴中得到一个字！”季柏清同学对麻排长要材料的回答总是“记不清”，气得麻排长结结巴巴地嚷：“好你个季柏清！你真是个‘记不清’！”正是由于同学的相互保护和对军、工宣队的顽强抗争，才使得运动中少死了多少年轻生命，才使得运动后少定了多少“反革命”分子！

科大师生在文革中抵制迫害、保护受害者的行动，是人性中真善美的体现。纵观整个的文革过程，实际上也是追逐权势政客的丑陋灵魂和普通人民真善美人性的一次大碰撞的过程。美丽和丑恶在这个过程中，都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在这个人性的展现中，相较于其它学校，科大人表现得更为突出。来自科学院班底的科大校长、老师，多是各领域的泰斗；科大的莘莘学子，多是立志科学的青年才俊。他们的心中，有的是攀登科学高峰的愿望，少的是官场上追逐权力的私欲。在那个时代，你只要淡薄了权力，人性中美好的东西就非常自然地绽放出来。我热爱科大，科大人所具有的美好的人性是重要的原因。现在有些中学、大学，常津津乐道培养了多少高官、名人，排名如何靠前，但很少反省为何在文革中内斗整死那么多自己的兄弟姐妹。一个学校，没有教会学生做人，还有什么资格说别的成绩？

我手中有周平在九五年写的文章“阳光灿烂的日子？”。她在文章中描写了在科大抓“雄师”分子的情景，也是科大人的一次人性光辉在闪亮。周平是我北京东城区四条小学的同班同学。入科大新生体检时我看到她的体检表，才知道她也上了科大。直到她走上刘达书记的礼堂讲台抗议，我才把人和名字对上。以后虽无联系，但关注她的文章。她在文章中写道：“1967年元月十四日，那是一个多么寒冷的夜。那天夜里，一辆车子到科大校园里逮捕了五个‘雄师骨干分子’，有人在寂静的操场边上大叫：‘抓人了！’许多学生、老师、工人、家属闻讯赶到了校东大门，车子被堵在离东大门的不远处就挪不动了。愤怒的人群在车子外面质问：‘凭什么抓学生？’‘写一张大字报就抓人，不符合十六条！’这时我听见车里有人说：‘科大反中央文革的势力太强，简直成了反革命老窝了，太嚣张了。’双方大约僵持了两个小时，最后是调来了警察，才把堵在路上的人群驱开，车子才开出玉泉路科大校园，但仍然有上千人拥挤在道路两旁和校门口，在那漆黑的冬夜，在那冷冽的寒风中，默默地为我们送行……这是多么悲壮的一幕！”

这就是我们的科大人，越是在逆境中，她人性的光辉就绽放得越美丽。

带着深深浅浅的心灵伤痕，我们离开了白湖。潘高建等同学，因为问题严重，不准毕业，继续交代。在这次运动中，全校有多名同学自杀，他们的冤魂，永远留在了安徽的大地上。运动带来的后果，远不止那几个月对同学身心的伤害。几年前，几个同学见面时，孔晓军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离开白湖时，我们对前途是多么悲观。我听说，潘高建被分配工作后，在和他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时，他女朋友的家长，坚决反对他们谈恋爱，其原因就是老潘在白湖背上的问题鉴定。我在零五年曾见到老潘，他的工作、生活看来都不尽人意。人生的旅程是环环相扣

的，可见，这个运动对他的一生有多大的影响！

几十年过去，历史的是非曲直和忠奸善恶，已经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分明。已到暮年的我们，反思着历史的同时，也在审视着自己。我很感动，有些同学，因为当时在压力下做了些不利于其他同学的事而道歉。我和他们一样，没能像张之欧那样的绝然和干脆，也“揭发”了孔晓军、徐乃庄的一些言论，我向要向他们道歉。但时至今日，我没有听到那些整人的发起和执行者们的任何忏悔和道歉。美国政府为几百年前对华人的不公平道歉了，德国的总理为纳粹迫害犹太人下跪了。共产党的政权没有更迭，当初的安徽省革委会，是现在省委的合法前任，你们难道不应该为他们的所作所为道歉？现在的科大校领导，也应该做些什么，还历史一个明白，还受害同学一个公道。周平的文章中提到，1979年，科大党委曾开过平反大会，给错整的科大师生（如雄师参加者）平反。我希望知道，安徽和科大是否也已经给一打三反中受迫害的同学正式平反；我更希望知道，安徽和科大是如何安抚和补偿那些自杀同学的家人的。一个简单的改正毕业鉴定，对于受到那么大伤害的同学和家人们，也太轻飘飘了。

五十多年过去了，我们垂垂老矣，但经历者都在，可以权威性地把科大南迁和一打三反运动的真实情况留给历史。如果现在不做，再过些年，当事者先后逝去，历史的真相就会被淹没。“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尽成灰。”希望“青史成灰”者必是做孽之人！巴金先生曾呼吁建“文革博物馆”，只需要毛纪念堂那么大的地方足矣，留在这段历史，但没有建成。“华夏文摘”这个海外的中文第一网站，随之开辟了文字的“网上文革博物馆”，搜集所有文革期间的文章保存起来，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只有敢于记住历史、敢于正视历史的民族，才是有希望的民族。

~~~~~

## 【不堪回首】

### 《湖殇》——白湖蒙难四十四年祭

• 梁伟清 •

（本文作者为中国科技大学近代物理系64级学生。）

44年前的4月20日前后，是我在安徽白湖一打三反运动中被宣布隔离审查的日子。

——自己的事，自己都不说，不但可能永远被湮没还可能被人篡改；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学说话大概只花了两三年的时间，却要花一辈子去学闭嘴。  
——沉默是一种权利，开口也是一种权利，与智慧无关；  
——我选择说真话，留真相是因为把真相留在人间总比带走有价值；  
——如果有年轻人在某一天读完本文后说：“原来如此！”我将十分满足；  
——于是便有了下面这篇文章：《湖殇》。

为了阅读本文时心情轻松一点，特邀读者先行欣赏一下民国才女林徽因在她花季年龄时的玫瑰情怀：

你是人间四月天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笑响声点亮了四面风；轻灵

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你是四月早天里的云烟，  
黄昏吹着风的软，星子在  
无意中闪，细雨点洒在花前。  
那轻，那娉婷，你是，鲜妍  
百花的冠冕你戴着，你是  
天真，庄严，你是夜夜的月圆。  
雪化后那片鹅黄，你像；新鲜  
初放芽的绿，你是；柔嫩喜悦  
水光浮动着你梦期待中白莲。  
你是一树一树的花开，是燕  
在梁间呢喃，——你是爱，是暖，  
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

你可曾拥有过此生不能忘却的人间四月天？你可曾在四月天拥有过象林徽因一样“是爱，是暖，是希望”的情怀？一群对未来生活充满憧憬的才华横溢的激情青年，在他们大学生活的最后一个人间四月天本应有林徽因笔下的梁间呢喃，也应该牵着所爱的手在暖阳花海中徜徉。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恶梦，而正是这场恶梦使得这群科大学子的命运在44年前的一个四月天发生重大转折。他们的人生厄运从此而开始。

#### 一，“一打三反”的概况与回顾

直到最近我才知道白湖农场地处安徽庐江县境内，它是1953年围湖造田而成，分成东西两个大圩。其占地约162平方公里，是中国著名的特大型农场之一。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它已经是一个劳改农场！现在它的名字叫做安徽省白湖监狱管理分局，在这里关押改造过的犯人已经超过30万。我原来以为它是军垦农场，至今我才明白我们是被禁闭在一个劳改农场里被批斗了120天。这段往事经常使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前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笔下的古拉格群岛……

根据同学们所提供的数据，一个只有二百多人的大学生团队（科大四系64、65级），被整肃斗争的比例超过46%。也就是说，将200多人的四系学生围困在白湖孤岛上，剥夺了所有人的人身自由后，由军人挑动和强迫其中的一半对另一半进行了长达3至4个月的残酷斗争。其中使用了“背靠背揭发”、“谁不办就办谁”、大小会批斗、无产阶级专政高压、日夜跟踪监视、诱供和欺骗恐吓及挑拨离间等等反人道手段。这是一种大规模的精神迫害和人权践踏及人格污辱，我把它叫做思想屠城。而这些被批斗整肃的大学生的年龄只不过介乎23—26岁，他们手无寸铁，只是和平地表达了对毛泽东、林彪、江青、中央文革和文化大革命错误的不满和批判。而打倒四人帮后的中共中央已把文革定性为一场“浩劫”。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些被整肃的学生是完全正确的。虽然在打倒四人帮和否定文化大革命后这些同学的档案都得到了清理，但对这些处于人生青年时期的同学们的精神和前途已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永久伤害。据我所知象潘高健、马梅杰、蒋荣杰、季柏青等一大批同学的婚姻家庭及事业前途都受到了多年甚至是一生的损害。一些人的身体及精神状态更是受到了严重的摧残。多对热恋中的男女同学被残酷地棒打鸳鸯，因而情断白湖，遗恨终生。

凡是挨整肃的同学，档案都被塞满了一大堆骇人听闻的结论后被发配到最边远最贫困的小县或小厂矿甚至是最底层的生产队。在以档案治国的毛时代，这无异于背负沉重的十字架而永世不得翻身。为了在社会上证明自己，至少也要比一般人多花上几倍的时间和力气。甚至穷其一生而终于徒劳。在一些极左横行的地方，即使在清理了档案之后这种伤害并未停止。以笔者

为例，1980年在已经拿到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后，车间的党支部书记仍然不给我签名放行。理由竟然是我的思想没改造好，到首都北京读书不合适。因为他老婆是厂里的人事科长，所以他熟知我清理之前的档案材料。在这种体制下，一位小小的车间党支部书记往往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而此时离开白湖已经十年，离档案被清理干净也已长达两年！白湖留下的恶梦仍然象一条无形的绞索在我的脖子上缠绕！

由于当时失去人身自由和消息被封锁，可谓无知者最无畏。其实644、654这些挨整肃的学生情况一度非常危急，甚至可以说是命悬一线。因为这次运动就是冲着思想言论而来的。1970年1月30日，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的讨论修改稿报送毛泽东、林彪，并提出：“我们几经讨论，认为现在需要发这样一个指示，给在备战动员中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坏活动以打击。”毛泽东批：照办。31日，《指示》发出。（《周恩来年谱》下卷第346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文件指出：“苏修正在加紧勾结美帝，阴谋对我国发动侵略战争；国内的反革命分子也乘机蠢动，遥相呼应，这是当前阶级斗争中值得注意的新动向”。因此，要在全中国“对反革命的各种破坏活动”“坚决地稳、准、狠地予以打击”。

正是这个中央文件使这次运动呈现出三大特点：

- 1，要从重从快判杀一批思想犯。
- 2，批捕的审批权可以下放到市、县革命委员会首长一级。省革命委员会一级掌握本省的批杀大权。
- 3，可以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捕杀，因为当时的中国司法已荡然无存。

70年3—6月份是全国从重从快大杀思想犯的几个月。70年3月5日，光是北京就在这一天枪杀了遇罗克等19人。70年2月安徽省蚌埠市固镇县的方忠谋因“攻击毛主席，为刘少奇翻案”被儿子和丈夫揭发，4月11号便被枪杀。从案发到枪杀只有短短的两个月，这便是从重从快的含义。请看下面这份清单：

- 2月12日，南京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处决了“政治犯”查金华等人。
- 3月11日，南京军事学院训练部长蔡铁根以“反革命集团罪”在常州被处决。
- 3月19日，“政治犯”张坤豪等在河北省保定市“三皇庙”体育场公判大会后被处决。
- 4月11日，被丈夫和儿子举报的方忠谋被以“现行反革命”罪判处死刑而枪毙。
- 4月14日，“政治犯”的毛应星等，在甘肃被处决。
- 5月8日，“政治犯”，24岁的女知青丁祖晓被处决。
- 5月30日，“政治犯”忻元华等，在新疆被处决。

上面的清单只不过是冰山之一角。单是在1970年，在全国一共就逮捕了28.48万“反革命犯”，据统计这是自1949年后全国以法办的名义逮捕和枪杀思想言论“犯”最多的一次政治运动。

遇罗克的主要罪行是他的代表作“血统论”，方忠谋的主要罪证是为刘少奇翻案。须知他（她）们的“反革命言论”和四系64、65级中被批斗学生的言论相比只能算是小巫见大巫！单是合肥市的革委会主任就手握生杀大权，遑论安徽省革委会主任？当时我所在三排的排长（军代表）就曾厉声威胁我：“你们这些思想言论已足够枪毙几次！”足见命悬一线并非虚言。至于到运动后期所有被整肃的学生为什么都只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个中原因不详。

## 二，我的遭遇

这种受污辱和伤害的经历是刻骨铭心的。为了勾起那段往事，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毛泽东的两篇文章。这两篇文章本来是国共内战时期在共产党军队围歼国民党军队时毛泽东为了攻心和施加高压而写，但在运动中却被用于对付手无寸铁的学生，用高音喇叭反复广播，在大会小会的批斗中被反复使用。其中最主要的段落如下：

《南京政府向何处去？》——“两条路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军政人员的面前：一条是向蒋介石战犯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靠拢，这就是继续与人民为敌，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蒋介石战犯集团同归于尽；一条是向人民靠拢，这就是与蒋介石战犯集团和美国帝国主义决裂，而在人民解放战争中立功赎罪，以求得人民的宽恕和谅解。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已在十五日晚全军覆没，李延年兵团已掉头南逃，你们想和他们靠拢是没有希望了。你们想突围吗？四面八方都是解放军，怎么突得出去呢？你们这几天试着突围，有什么结果呢？你们的飞机坦克也没有用。……在我们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你们的阵地大大地缩小了。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横直不过十几华里，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你们的伤兵和随军家属，跟着你们叫苦连天。你们的兵士和很多干部，大家很不想打了。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当军长师长团长的，应当体惜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爱惜他们的生命，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的牺牲了。现在黄维兵团已被全部歼灭，李延年兵团向蚌埠逃跑，我们可以集中几倍于你们的兵力来打你们。……”

毛泽东的这两篇文章，把我的思绪带回到44年前那个凄风苦雨的四月——

1970年4月初，在科大四系军工宣队的电报催促之下，我不情愿地告别了家人来到四系师生所在地安徽省白湖农场报到。由于迟来，所以多次的超体力惩罚性劳动我都没有参加。我是故意迟到的。因为早在69年底还在北京校园的时候，我就判断这次搬迁去安徽一定会充满艰险磨难，所以我把行李打包交给学校搬运处后并没有跟随大队伍行动而是一心一意地回广东过年了。我对于去安庆和所谓的28个半行动均一无所知。在即将告别玉泉路科大校园之际，我恋恋不舍地绕校园走了一圈，只见人们面容凝重，行色匆匆。初冬的寒风卷起满天的废纸和落叶，更增添一层乱世逃难的荒凉。正在这时，高音喇叭里却播出“十送红军”的歌曲，我立即想起了李后主的“最是仓皇辞庙日，教坊犹奏别离歌”，一种国败家亡般的心境油然而生。前路茫茫的感觉真是催人泪下。

在白湖一报到便感觉到我所在的三排之排长（军代表）充满了恶意和杀气。他个子不高，圆脸，上门牙稍刨，眼大且寒气逼人，操一口浓重的安徽口音，声音尖而略带沙哑，年龄和我们相仿。他对我讲话时口气相当严厉而且不断地用大眼睛观察打量我的反应，仿佛要从我心窝里掏出什么似的，我当时便疑心他是特务连出身。

我的床位被安排得十分奇特：左边是6542班的陈同，他是我们年级中有名的肌肉男，发达而健硕。右边是644的一位同学，由于平时没有交往，故不知其名。他体弱，和我不在一个量级。运动开始后我才知道这一左一右的任务就是为了监督我的：预防自杀、逃跑及“反革命串联”等等，是专为“对敌斗争”而安排。最重要的是我床位的斜对面即是这位三排长，是观察监视我的最佳位置。果然在运动高潮中当我转侧不能入睡的深夜甚至凌晨时分，我都曾发现他在隐蔽地窥探我。事后回忆起来这是十分周密精细的布局：所有和我过从甚密的同学不是在其他排就是远离我，即使离我最近的胡海泉也相隔至少十几个床位，我的周围全部都是平时不曾深入谈论时政的同学。一左一右的两位保镖同学更是甚少交往。我至今仍然百思不得其解：运动还没展开，军代表凭什么作出如此精确的安排？



运动的风声日紧。终于在四月中下旬的某一天，三排长突然对我宣布：由于你有严重问题，从今天起你必须接受审查，不准乱说乱动，要老实交待！从这一天开始我就被剥夺了自由：上厕所所有人尾随监视，吃饭不能自己去打，由陈同或其他人吃完饭后代打送来（当然是冷菜冷饭），床头也贴上了标语，一条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另一条是：坚决打击一小撮帝修反别动队！无产阶级专政万岁！我左右二位保镖的脸部表情也从这一天开始变得严肃起来，眼神亦十分冷峻。我当然十分理解他们，因为他们是在执行任务，逢场作戏是必不可少的。在长达100多天的时间里，他们从来没有给我打过小报告。有一次胡海泉趁着路过我床前之机（上厕所必经之路）给我弹射了一个互相串联的小纸团。虽然我以螳螂般的速度抓住了小纸团，但是我还是感觉得到身边的陈同猛地一震。但他随即恢复常态继续靠在床头写东西，他好像什么也没看见，极其平静。我明白他什么都看在眼里了，只是心照不宣罢了。如果他当时揭发，他会立一功，而我和胡海泉必定罪加一等，全排批斗是必然的。

在运动的初期我并不紧张，甚至还相当轻松。只是交待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一付炖不烂的心态。在大量的时间里我都在回忆默念唐诗宋词，却在纸上装模作样地写写画画。由于我的床位最靠近厕所，所以凡是三排上厕所的人都必须经过我床前，使我得以观言察色来判断运动的形势。我特别关注蒋荣杰，季柏青，马梅杰及胡海泉的动态，因为我和他们平时交流最多，可以算得上一荣皆荣，一损俱损的关系。但直到运动结束我都没机会看到蒋，季，马三位同学一眼。胡海泉与我在同一个排，可以天天打照面。他有一件蓝色棉大衣，咖啡色灯蕊绒翻领，经常披着从我床前走上厕所。我见他抬头挺胸而表情刚毅，便判断他并没有交待什么核心言论。他弹给我的纸团上写“没事”二字，使我信心大增。每次见他披着那件棉大衣从茅草房的另一端缓缓走来，后面还跟着一个尾巴，竟使我奇怪地想起了红灯记中的李玉和、红岩中的许云峰甚至狱中的方志敏形象，真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十分悲壮。但是到了五月份形势却急转直下。有一天高音喇叭突然广播了五系揪出了“许小昆反革命小集团”的消息，而且四系也揪出了“马小昆反革命小集团”，一时间真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势。“XX不投降就叫他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每个班排每天都在紧锣密鼓地开着大大小小的批斗会，口号声在每个学生排营房的里里外外此起彼落，甚至在我离开白湖的好几个月后每当我要睡觉时还觉得这种口号声在耳畔回响。被批斗的男同学胡须如野草而面有菜色，而被整肃的女同学则披头散发形容憔悴。此情此景如在目前。

在这之前我交待的很少，只不过是敷衍罢了。直到有一天我被警告：“你不要以为我们不知道你的反动言论”，并向我出示了我在某某场合讲的几条证据。形势的紧逼使我不得不作出必须的选择和评估：

- 1，一律都坚守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 2，必须对轻重缓急作出安排。
- 3，有一句话不到最后时刻不能说。

其实我在文革中对毛的批判言论并不多，只不过是一些诸如“毛泽东像斯大林的晚年”之类的大路货。我的主要言论都集中在江青和林彪身上。其中反对林彪较激烈。因为我对林彪搞大树特树和个人崇拜甚是怀疑和反感。即便如此，按照文革时期的专政标准被投入大牢已经足够了。在这种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压之下，最受折磨的其实是对家人的焦虑。在形势最严重的时候我想到了坐牢，也想到了被杀，因为在文革时代什么都可能发生。但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已年过八旬的祖父母，辛劳一生的父母及年幼无靠的弟妹。因为我们这一生已经见过太多的株连：地富子女，历史反革命家属，右派子女，黑帮子女等等，这种株连已经使千万个家庭多年陷于万劫不复之中。这是精神的巨大压力也是求生的最大动力。但我没有响应“竹筒倒豆子”，我是挤牙膏式的交待。这种不痛快的方式被认为是态度不好，导致了后来连毕业分配会议都不让我

参加。其中对林彪最尖锐的言论有：

“林彪大树特树实际上是树他自己。”

“林彪在挟天子以令诸侯”

“林彪要上台一定是玄武门之乱”

“林彪如果上台我就到香港办报纸揭露他”

这最后一条被认为是不但有思想，而且是有计划和有行动了。加上我是广东人，春节后又迟迟不归，所以一直怀疑我在广东策划“投敌叛国”。但这一条我一直坚持到运动的末期，看到形势已经松动的情况下才承认的。

在运动最严厉的时候，两位保镖日夜监视陪伴我，不准我去打饭，上厕所要报告而且有尾随。长达3—4个月连散步放风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点连监狱的犯人的待遇都不如。如此遭遇，我怎么可能怀念白湖饭菜的飘香和风景的秀丽？

到了六月下旬，气氛明显有所放松，对我的监管也不那么严格了，我也可以自己去打饭了。从同学们的脸上也可以看出形势和心情在变化。七月初，三排对我和胡海泉等人开了最后一次批判会，并让我们作了检讨。也就是在这次批判会上我第一次听到“梁伟清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口号，至今我都不知道这句口号是“领导”预先拟定的还是领呼人的即兴发挥。我当时相当的惊愕，因为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既然运动已经接近尾声怎么还喊如此充满火药味的口号？是不是要把我打入另册？当然，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只是一场虚惊。

到了七月中下旬，开始见到大家有说有笑，一脸的轻松，也没有人再看管我了，但也没有人理我，上面也没有任何人跟我打招呼。我见到同学们都进行行李房收拾行李了，我的问题仍然无人过问。我也不焦急，因为凭我对政治斗争的敏感性，我知道不可能把我当敌我矛盾处理了，顶多是延迟分配或分配得比较差。终于有一天，郑汉磷和朱冬轩代表上面和我谈分配了。

### 三，毕业分配

我被取消了参加分配会议的权利，所以我没有听到分配文件的传达。郑是主谈，朱没有说话。经过一番必不可少的挽救教育之后，直入主题：

“现在要分配了，广西有名额，你去吗？”我对广西历来不看好，除了刘三姐和漓江外，我实在不知道广西有什么可以吸引我的。

“我不想去广西，我想回广东。广州有名额吗？佛山也可以。”我不假思索地回答了郑汉磷。你们可以想象当时他们脸上的表情，因为整个64、65级哪怕是毕业结论最好的人也没有一个可以直接分配到广州或佛山，遑论我这个“反革命边缘分子”？这种又臭又硬的“死不悔改”态度必定使得他们哭笑不得，我也立即觉察到这有“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的嫌疑。

“不可能！湖南怎么样？”郑汉磷有些不耐烦了。

“好的，我去湖南。”我对湖南历来有好感，不管是“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还是“惟楚有才，于斯为盛”都给我印象深刻。我知道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也只能如此了。

定下分配方案后，虽然我不知道未来什么在等待着我，但我感到无比的轻松，真有一种大病初愈的感觉。我重新获得了自由，于是决定到外面走一走，晒一晒久违的太阳。这时谢指导员从他的办公室径直向我走来。这使我感到奇怪，因为在这之前他从来没有跟我说过一句话。看来他是有备而来。

“这是你的电报”，他递给我并带着异样的表情，我至今仍然清晰地记得他那嘲弄的眼神和嘴角轻蔑的微笑。我迅速把电报打开并飞快地扫描了一下。“祖母逝世速归”，我看了一下日期是五月份的，已过去两个多月了。突然而来的打击加上三四个月的身心摧残使我觉得眩晕，我蹲了下去。等我重新站起来的时候才发现他已经走了，没有作任何解释。一种被欺凌但又十分无助的感觉浸透了全身。是的，他代表着权力和无产阶级专政，我一介草民和他心目中的反革命边缘分子在他眼里算什么？

我自懂事开始就和祖母生活在一起，直到11岁才回到父母身边。我是家里的长孙，不但不能给她送终，而且连发一封唁电的权利都被剥夺了，这成了我心中永远的痛。扣押私人信件不但在法治国家是非法的，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也是违法的。但在那个时代的中国，阶级斗争是不讲法治和人性的，人权被践踏是家常便饭。家里父母见我几个月没有任何音信，甚为焦虑。后来我弟告诉我，母亲那几个月茶饭不思，夜不能寐，几乎病垮。直到我自由后给家里发了电报才好转。而我的电报只能对父母说假话：工作繁忙，平安勿念。

当我从祖母去世的悲伤中苏醒过来后，才想起我该去收拾行李了。当我走进阴暗潮湿的行李房，才发现所有人的行李都已经收拾完毕，满地都是草绳和破纸箱并散发出一股霉味。我已经快四个月没有看我的行李了，却发现书箱和皮箱早就被撬开。我知道这是必然的待遇——审查对象被抄家了。在文革中我目睹了无数的抄家事件，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会落到自己的头上。我有两本读书笔记，一本抄录了大量的唐诗宋词及我所喜欢的海涅，普希金，歌德，雪莱等的诗歌；另一本则记录了我对马恩列斯毛及欧洲一些思想家著作的读后感，其中特别对毛的一些说法提出了质疑。这本笔记本就被剪得七零八落，估计是拿去当作我的罪证吧。但最使我愤懑的是我祖父写给我的家书被毁。1965年当我被科大录取后，我祖父给我写了一封家书，我十分珍爱，一直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箱底。我祖父是晚清时代人，由于他幼时家境还算殷实，很是读过一些书。这封家书是他已年过八十高龄之际手执毛笔用文言文写成。

我只记得信的末尾有“务应刺股悬梁，使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他日若衣锦还乡，为祖当九泉含笑矣”之字句。对于一位清末过来的老人，实属平常话语。但竟然连一封这样的家书也不放过（我估计是当作封资修思想被付之一炬了）。阶级斗争真是毫无人性可言。事后我想：幸亏我没有情书，否则隐私变羞辱，情何以堪？

离开白湖的日子终于到了，我记得是1970年8月5号的早上。3，4个月以来我终于看到了蒋荣杰和季柏青，他们的神态忧郁和脸色苍白。他们在二三十米外以目光相送，我想上前告别但不可能，只好无奈地离开了。我知道蒋荣杰家里困难，我领了第一个月的工资（46元）就给他弟弟蒋荣根寄了20元过去，权当慰问吧。但我始终没有见到马梅杰，直到1997年在深圳才见到他，这时已过去27年了。

2012年同学们一起去银川玩的时候董雪生问我：你还记得毕业分配后在合肥吃饭告别的时候，我问你一打三反为什么会弄成这样（挨整），你知道你是怎么说的吗？

我当然记得。当时女同学单独一桌。我是这样回答董雪生的：“主要是野心太大了”——其实我毫无政治野心。即使在那个疯狂年代我也毫无政治野心。这只不过是自我调侃之言。疯狂故事皆源于疯狂时代，如此而已。

在合肥和大家分手后，受余天禄的盛情邀请到他位于西湖边上的家里小住了几天。记得他有一位才13、4岁的小弟陪我游玩了西湖。这是我第一次玩西湖。八月的西湖真有“暖风吹得游人醉”的感觉，也使我的心情得以舒缓。至今仍然不忘余天禄同学待人之宽厚。

#### 四，后遗症

运动的结束和毕业分配并不意味着好日子的到来，事实证明厄运才刚刚开始。在以档案治国管人的年代，档案如影相随，恰如一根绞索永远勒在人的脖子上。到湖南报到后，所有科大的学生都被安排到洞庭湖农场接受再教育。几乎是和白湖一样的草房，一样的通铺，一样的泥泞，一样的兵管秀才模式。和我在同一个连队的有林善敬、朱冬轩等人。在这里我经历了林彪的913事件，这使我大为宽心，因为在我的档案中反对林副主席是一大罪状。贺平（邓榕老公）和我同一连队，他是哈军工的。林彪出逃的消息是从他处得到，比文件传达早得多。经过一年半的艰苦劳动，我非常卖力。第二次分配后，几乎所有人都如愿以偿，或回家乡，或去长沙、株洲、湘潭等最好的城市。如林善敬、朱冬轩、黄仁初、徐新林、金忠权等去长沙，章善梁去了湘潭，惟独我被发配湘西——溆浦县沅江边上。这是汨罗江的上游，是屈原顺流而下行吟天问、九歌和离骚的地方。这使我意识到：所谓思想改造是徒劳的，因为有档案在起作用。

我所在单位叫湖南省维尼纶厂仪表车间，当时只是一个筹建处和工地，一切从零开始。这一干就是八年。从翻译仪表资料、写操作规程、校验安装、培训工人一直到试车开车投产，也是尽心尽力了。电工原理、电子线路、控制论、高数、英文等课程就是在这里自学的。也许是应了“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传统，老实干活竟然也充满了磨难。车间党支部是位工人提拔的极左分子，他带领着几位不学无术但又酷爱献媚表忠的三四流大学生不断地折腾：批林批孔他们冲在最前面，批邓也冲在最前面，毛死又哭得最伤心，批四人帮还是他们嗓门最大。直到上面布置批判“两个凡是”他们才像被打镇静剂一样停止了鼓噪。我认为这是难度极高的事情：除了演技，还必须加上深度无耻和人格分裂才能做到永远正确，永远是左派，永远都是最革命。我则是潜心业务，坚持“大会不发言，小会不发言，宁可前列腺炎”的原则。结果还是被当作落后典型批判，说我“不关心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不表态就是最大的表态”，真是躲都躲不开。环境如此恶劣如何生存？不管我工作多么出色，加工资、评奖金、提拔重用永远与我无缘，因为我有那份档案。即使档案已被清理，也并不等于万事大吉。

1978年可以考试了，我知道我的机会来了，这是我唯一的跳板，我必须背水一战。但难以想像的是，即使我被录取，这位党支部书记竟不签字放行，理由之荒唐竟是“思想没有改造好到北京读书不合适”，真使人啼笑皆非。哪怕是党支部书记这小小的权力一旦属于私有，也足以毁掉人的一生。研究生毕业后我终于如愿以偿地分到了珠海市，1984年把家里人也调到了珠海市。在被折磨了长达14年之久，历经千辛万苦之后我终于摆脱了白湖一打三反留给我的厄运。

在这里我要十分感谢四系的杨衍明教授。我在湘西的山沟里备考研究生期间无处买书借书，写信向他求援。他立即给我寄了一箱书，真是雪中送炭，尽解我燃眉之急。我能考上研究生，杨教授功不可没。在科大的几次重体力劳动中我曾照顾过杨教授，没想到在我危难困顿之时便得到了他的鼎力相助，真是杯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不知杨教授现在可安好？祝他好人一生平安。

#### 五，回望白湖

有人问：你面对一群年将70的老头老太写这样的文章有用吗？这纯属误解。我的回答是有用。因为在网络时代，我不但面对年轻一代而且面对全世界。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革的一部分。文革虽然被执政党否定，但并没有认真地总结反思。不但没有全民的反思，政府层面也没有深刻的反思。我们的档案虽然被匆匆清理，但当局从来没有给出什么说法。这就似乎形成了一种想象空间：一打三反政治上是正确的，清理档案只是一种策略。

你能保证你的子孙后代不再被卷入一打三反式的灾难吗？644、654这批人的父辈大部分不是共产党的各级领导干部就是工人和贫下中农出身，是执政党的依靠力量。但他们绝对预料不到他们的子弟会被陷入一打三反之灾。

对国家政治灾难的反思并产生了良好效果的有：法国反思了人权并制定了著名的人权宣言；美国反思了种族歧视并制定了种族平等的严格法律；德国反思了法西斯纳粹主义并写进了宪法。这些国家都是法治和长治久安的典范。

我从来都主张在同学之中宽容和谅解。不要再去追究历史责任。因为对于一个18，9岁至25，6岁的年轻人，在文革这种年代是纯属被欺骗利用并最终被抛弃。

但对于科技大学一打三反运动的决策者和政策执行者是必须追究历史责任的。

据查证，69，70届的分配文件于1970年6月份已下达，要求7月份必须分配离校。也就是说，中央应该在五月份之前已经在筹划分配事宜。这就决定了中央不可能又在同时筹划在全国的高校学生中大张旗鼓地开展一打三反运动。科大以学生为重点对象不顾拖延分配而大搞运动完全是一种自主理解和怎样执行的行为。我在湖南洞庭湖农场时向同时接受再教育的哈军工，北航，北农大，中南林，湖南农等校的学生了解过，他们说只是以教育学习为主，并没有在学生中大抓思想犯。这也是有力的佐证。

除了大环境之外，各地政策的偏差所造成的后果也相差巨大。比如“三年大灾荒”时期，每个省所饿死的人数相差巨大，有的甚至相差十倍以上。其中河南，四川，安徽饿死的人最多，这就是掌权的区别。科大的一打三反被严重扩大化，这与当时的掌权者对“敌情”和“阶级斗争形势”的判断有关，也与其极左思维有关。

此外，人性是有差异的。当年守卫柏林墙的东德士兵向偷渡者开枪时，有的瞄准了脑袋和心脏，有的却故意抬高了准星。朱柏生遇到了石政委，使他得以绝处逢生。不幸的是，我们却摊上了冷血加极左的操刀手。如果四系不是被包围关门整肃，出人命是不容置疑的。但这种关门整肃，却使得政治迫害和身心摧残更加残酷和令人发指。我不知道在一打三反中被迫害致死的科大师生得到了怎样的善后处理，但是如果这些双手沾满了科大师生血泪的投机者，不但不需要担责，还利用这种“政绩”长期升官发财的话，这种抑善扬恶的弊病，必定后患无穷，于国于民都十分有害。白湖蒙难已过去44年，我这位当年的“反革命边缘分子”不但没有按照他们的批判改造世界观，反而得出了下面的结论：

——暴力的专政和高压只能使人暂时闭嘴和违心地说假话，而绝不能使人停止思考和说真话。

——人类不应该有思想罪和思想犯，这是衡量一个社会是否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准之一。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一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的立命之本。

英国伟大的思想家洛克在三百多年前就预见到：“权力不能私有，财产不能公有，否则人类就进入灾难之门”。

我们这些物理学子所敬仰的物理天才爱因斯坦在社会科学方面的深邃思想之光也可以穿透宇宙的黑洞到达地球的东方：“在我看来，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质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

谨以此文追忆在科大逝去的青春年华。  
谨以此文献给在白湖蒙难的所有同学们。

~~~~~

【研究报告】

文革“斗争会”（四）

• 王友琴 •

（上接 zk1501c）

四，“斗争会”由来

1，“斗争”词义变迁：并非中国传统

“斗”和“争”都是古老的汉字。按照《说文解字》（公元121年）正文和注释，前者（指繁体字“鬥”）是两个对立的人，身后各有兵器。“争”是两手把东西引向自己。汉语里有“斗鸡”“斗蟋蟀”之说，是指双方互相“斗”。有“争利”“争艳”，指要得到“利”和“美丽”。二者都不像“打”或者“杀”，那两个字可以用在“你打他”“你杀他”这样的句子里。

在《辞源》和1990年代出版的《辞海》中，都没有收入“斗争”这个词，尽管在很多年里这是中文的最常用词之一。在日文大词典中有“斗争”词条。该词条指出，“斗争”最早出自《韩非子》（显学：宋荣子之议，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世主以为宽而礼之。）。作为一个由两个汉字组成的新词，在日文中“斗争”的意思类似中文的“冲突”或者“战斗”。日文在20世纪初有了“阶级斗争”，是日本人用汉字翻译的来自西方的说法。翻译的时候，从中国的古书《韩非子》里找到了“斗争”二字并用。“阶级斗争”一语后来传入中国并被经常使用。另外，日文把希特勒的书名翻译为《我的斗争》，中文则翻译为《我的奋斗》，可以看出日文的“斗争”的另一个意思像中文的“奋斗”。

“斗争”作为一个双音节词从日文进入现代汉语。在文革时代“斗争”成为使用频度最高的词之一。笔者在电脑上统计了中共中央1966年5月16日发出的关于开展文革的《通知》（后来常被称为“516通知”，是文革的纲领性文件之一）中的高频度出现词语。在这个4,684字长的文件里，出现“阶级”一词114次，而“斗争”被使用了31次，甚至比“革命”一词（21次）使用次数更多。

在汉语中，“斗争”不但成为常用词，而且词义改变了。“斗争”最初的意思是双边互相“斗争”，和传统说的“斗鸡”“斗蟋蟀”相似，双方都可以攻击和防守。在“阶级斗争”这个词语中，也还有这样的双边互相“斗争”的意思。但是在“斗争会”、“斗争反革命分子”这样的上下文里，“斗争”成为“及物动词”，而且后面的宾语是人，被用在“张三斗争李四”这样的句法结构里。而且，从“斗争会”的实践，可以知道“斗争”意味着一方对另外一方的压倒性的侮辱、虐待、折磨，甚至杀害。

这一语义上的改变，发生在文革中的其他社会生活改变中，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或许也因此没有引起《辞海》编撰者的注意。然而，重要的是，这种改变不仅仅是一个词的习惯意义的改变，而是一种新的在中国漫长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社会生活实践开始出现并普及，

而且，这种实践并非一时一地偶然发生，而是蔓延到全国每个地方，也几乎影响了所有的人（不是被“斗争”，就是“斗争”别人），而且持续了十多年。“斗争会”在文革结束后，逐渐消失。

2，最早的“斗争会”

在笔者看到的文字资料中，关于年代最早的“斗争会”的描写是在姜贵（1908—1980）的小说《旋风》中。这部书写到1930年代—1940年代初山东共产党控制区的生活，其中有发生在一个叫“方镇”的地方的首次“斗争会”。书中写道：

方镇初次出现了斗争大会。

罪状原是现成的，用不着收集，因为两个人都是地主。只这一点，已经够了。

在省委代表和总队司令部扶持之下新成立的中共镇委员会，领导各街各巷委员会，挨家挨户，鸣锣通知，东岳庙前的广场上，斗争大会开始了。因为是首次，大家都有一个看热闹的好玩的心，当作看社戏一样，扶老携幼，纷纷而至。广场上人山人海，围绕着庙前的戏台。方八姑和方金阁，五花大绑，被推上台去，面众而立。只见一个共干，指手画脚演说一番，因为群众太嘈杂，谁也没有听见他说的是什么。另有几个共干，用皮鞭木棍把两个人没头没脑乱打一阵。

共干再演说，就有靠近台前的群众纷纷跳上台去，把两个人狠踢狠打。

……（台北：大众书局，1962，页449）

《旋风》是小说，人物和地名是虚构的，但是这种关于“斗争会”的描写却无疑是真实的。根据资料，姜贵亲身经历了那一段历史。小说里的这种描写其实可以成为史料。（关于这种来自小说中的史料使用，学术界有过专门讨论，在此不必详说。）

如果怕姜贵是反共作家可能夸大“斗争会”的恐怖，那么资深共产党作家赵树理（1906—1970，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对“斗争会”的描写其实相仿，只是他对此持肯定态度，很自然地写出来，不觉得有什么特别。赵树理最著名的小说《小二黑结婚》（1943）第六节小标题就叫“斗争会”。小说中写到在共产党掌权的村子里“斗争”某某人，是笔者看到的把“斗争”用作及物动词的最早的例句。在他的《李家庄的变迁》（1946）中写到了“斗争”地主的暴力场面，不但打人打死人，还把地主分了尸，比姜贵描写的更残酷：

只见已把李如珍（注：被“斗争”的地主）拖到，人挤成一团，也看不清怎么处理。有的说“拉住那条腿”，有的说“脚蹬胸口”，县长、铁索、冷元都说不好。说着挤到当院拦住众人，看了看地上已经把李如珍一条胳膊连衣服袖子撕下来，把脸扭得朝了脊背后，腿虽没有撕掉，裤裆已经破了。

赵树理写这部小说是在1949年以前。在1950年代初的全国性的“土改”中，有四百万地主死亡，其中很多是这样被“斗争”死的。

需要指出的另外一点是，赵树理本人在1949年后得到很高的职位和写作荣誉，但在打击目标进一步扩大的文革中，他本人也遭到残酷的“斗争”。在“斗争会”上他被打断肋骨，从台上摔下碎了髌骨。1970年9月17日他被押到省会太原最大的会场湖滨会场“斗争”。他在“斗争会”中昏倒在地，六天后死亡。如上文所说，这当然不是先前的受难者对他的“因果报应”。这也不必用带有玄秘色彩的“革命吞噬自己的儿女”来感叹。这是“斗争会”制度造成的结果。

3，文革前的“斗争会”

以上描写的是共产党执政以前的“斗争会”。作家老舍则描写过共产党执政后的这种大会。文章发表在1951年10月1日的《人民文学》杂志上。

会场是在天坛的柏林里。我到得相当早，可是林下已经坐满了人。

开会了。台上宣布开会宗旨和恶霸们的罪状。台下，在适当的时机，一组跟着一组，前后左右，喊出“打倒恶霸”与“拥护人民政府”的口号；而后全体齐喊，声音象一片海潮。人民的声音就是人民的力量，这力量足以使恶人颤抖。

恶霸们到了台上。台下多少拳头，多少手指，都伸出去，象多少把刺刀，对着仇敌。恶霸们，满脸横肉的恶霸们，不敢抬起头来。他们跪下了。恶霸们的“朝代”过去了，人民当了家。

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一的上台去控诉。控诉到最伤心的时候，台下许多人喊“打”。我，和我旁边的知识分子，也不知不觉的喊出来。“打，为什么不打呢？！”警士拦住去打恶霸的人，我的嘴和几百个嘴一齐喊：“该打！该打！”

这一喊哪，教我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向来是个文文雅雅的人。不错，我恨恶霸与坏人；可是，假若不是在控诉大会上，我怎肯狂呼“打！打！”呢？人民的愤怒，激动了我，我变成了大家中的一个。他们的仇恨，也是我的仇恨。我不能，不该，“袖手旁观”。群众的力量，义愤，感染了我，教我不再文雅，羞涩。说真的，文雅值几个钱一斤呢？恨仇敌，爱国家，才是有价值的、崇高的感情。

.....

笔者第一次读到老舍的这篇文章时相当震惊。他描写的这个“控诉大会”，这种“斗争”方式，和15年以后，1966年8月23日，老舍自己在北京文庙遭受“斗争会”如此相似。两个会有同一个模式：都是群众大会，都是先已经定好了被斗者的罪名；开会后，喊口号煽动情绪；所谓“揭发控诉”，都不准被“斗争”者为自己辩护，不用法律的标准来衡量，到高潮点与会者高喊“该打该打”，并对被“斗争”者使用暴力。老舍文章里写的被“斗争”的人被枪毙了。老舍自己在遭到这种“斗争”后的第二天，到北京的一个小湖（现在已被填没）投水身亡。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55万（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据民间研究，实际数字两倍于此）受过专业教育的人，教员、大学生、工程技术人员、科研人员、医生等等，被划为“右派分子”。“右派分子”都遭到“批斗”。笔者和北京大学乐黛云老师谈过她当“右派”的经历。她的《四院沙滩未名湖》里写得分明：“当时我正好生下第二个孩子，刚满月就上了批斗大会！几天后快速定案。在对右派的6个处理等级中，我属于第二类：开除公职，开除党籍，立即下乡接受监督劳动，每月生活费16元。”（14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根据资料，北京大学划了716名“右派分子”。“斗争会”的规模一定非常大。但是和北京大学在文革中的“斗争会”相比，又有很大差别。

4，毛泽东和“斗争会”

“斗争会”是毛泽东本人倡导和支持的，不但在理论上，也在实践上。在他1927年写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他用带激情的笔调描述了“斗争”地主的种种方法。这篇文章在文革中得到广泛阅读和引用，并成为具体的行动指导。这篇文章中虽然没有“斗争会”这一说法，但是多次使用“斗争”一词，并介绍了“戴高帽子”“游乡”，“小质问”，“大示威”，“驱逐”等后来在“斗争会”上普遍采用的具体手段。在这篇文章中他说“将地主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还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指的是权力地位，但在文革“斗争会”上变成了真的“踏上一只脚”，如上面描写的北京大学附中刘美德校长所遭受的，以及上文中提到的上海工艺美术学校和戏剧学院的照片所显示的。

据中共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的回忆录《七十年的征程》(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1966年8月3日南京师范学院教务长李敬仪和丈夫吴天石(江苏省教育厅长,已经被中共江苏省委宣布撤职)在“斗争会”上被打死,他在北京开中央全会,当面向毛泽东周恩来报告了这一情况。毛和周没有说批评的话。

毛泽东文革中相当关注如何“斗争”人。根据他的医生李志绥描述(《毛泽东私人医生》,台北,时报出版社,页472—473),1967年7月18日在共产党中央所在地中南海“斗争”了刘少奇和王光美。李志绥看到,“刘的头发被扯乱,上衣扣子掉了两个,被人将两臂向后拉住,腰弯下来,头几乎碰到地上。这就是所谓的‘坐喷气式飞机’。这时还有人上来,踢刘几脚,打了一个耳光。”邓小平和妻子卓琳也都在挨斗,但情况没有刘少奇严重。7月21日,空军司令部派一架飞机把他送到上海,他跟毛泽东讲了两遍北京“斗争”刘少奇的情况。刘少奇被“斗争”的场面拍下了电影(是否为了毛泽东要观看呢?),审判“四人帮”的时候披露了其中一小段,现在还可以看到。

毛泽东还亲自观看过上海的电视“斗争会”。1967年10月,上海警备区司令部廖政国对《解放日报》记者谈毛主席在上海的情况:

主席在上海看了批斗陈、曹电视:“假检讨,真反扑。”主席很满意说:“这是说理斗争大会,教育意义很大。”也看了三军斗陈、曹大会,看了一半。上海攻联司的电影也看了。

1968年7月28日夜,毛泽东接见北京的“造反派”五大领袖蒯大富等,在谈话中,毛泽东说:“我那个父亲也不高明,要是现在也得要坐喷气式。”毛泽东的这句话,当然也关系到他和他父亲的关系,也许会有学者用弗洛伊德理论来解释成他的“仇父情意结”。但是在文革的上下文里,显然带给人们的指令的意思是,他对这样一种正在普遍使用的文革形式的肯定和欣赏。

现在有人替文革领导人辩护,说很多事情是“失控”所致。中共中央文件提供了相反的证据。《中共中央关于各省市自治区报纸的几项意见》(1967.03.16;中发[67]104号)写道:

五、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等图片。

六、报纸上一律不要使用那些谩骂的词语,例如“砸烂狗头”、“混蛋”、“油炸”等等。

意思很清楚。只是“报纸上一律不许刊载”,而不是实际活动中“一律不许”作这些事情。是“中央”在引导和控制着“戴高帽子、挂黑牌子、罚跪、开斗争会”这些事情。从这个文件,也可以看出,文革领导人如何有层次地控制关于“斗争会”的宣传和记录。正式的报纸和杂志不刊载有关“斗争会”的消息,但是红卫兵和“造反派”的铅印而不正式发行的报纸报道“斗争会”消息并刊载一些照片,但是这些不报告导致的死亡。文革一直是乱中有序,领导人不但控制“斗争”什么人,而且控制怎么用文字来报告这些“斗争会”。说他们不知情来为他们推卸责任是不负责的说法。

中共中央还指导“斗争会”的种种细节,包括如何制造戏剧性场面。中发[68]74号文件标题为:中共中央中央文革转发毛主席关于“新华印刷厂军管会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的经验”的批示。文件开头是毛泽东的批示:

文元同志:

建议此件批发全国。先印若干份,分发有关同志,然后在碰头会上宣读一次,加以修改,

再加批语发出。在我看过的同类材料中，此件是写得最好的。

此厂情况，我已从个别同志那里听过两次。你是否可以去那里看一看，问一问？

毛泽东

5月19日

这个文件中有如下一段：

凹印车间有五个青年工人，在文化大革命中干了不少坏事。群众很气愤，要求揪斗。军管人员经过认真研究，注意到这几个工人是因为觉悟不高和缺乏经验受了坏人的蒙蔽和利用，真正的阶级敌人不是他们，而是蒙蔽，利用他们的人。因此他们说服群众不要揪斗这五个人，同时反复向这五个人宣传党的政策，鼓励他们检查交待自己的错误和对阶级敌人进行大胆的揭发。经过了这样一番工作之后，有一次在召开全厂对敌斗争大会的时候，五个工人中的三个主动地跑到台上检查了自己的严重错误，沉痛地向毛主席承认错误；与此同时，他们又当场向广大革命群众揭发了指使他们干坏事的黑后台，现行反革命分子于冬海。这时，五个工人中的另外两个，已经守候在这个反革命分子身后，等台上的三个工人一声招呼，他俩就把这个罪大恶极的坏家伙揪到台上，交给群众批斗。

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不但文革的主体部分是来自最高领导人的构想，连在“斗争会”上预先安排埋伏的人把“坏家伙”抓到台子上这样的细节，都是上面设计推广的。在上面写到的北京大学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大会”上，就正是按照指导这样做的。“斗争会”不是一个“群众”激情过度而自发产生的形式。

作为一种实践，如上所引的文字表明，“斗争会”最早用于“斗争”乡村地主，文革中的“发展”在于大规模引进了城市，特别是学校、文化机构，以及共产党的上层权力机构。这不仅是革命形式的发展，而且是和革命对象的不断扩展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文革前，虽然发生了对知识分子的迫害，特别是在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以百万计的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分子”，受到各种惩罚，包括死刑、判刑、劳动教养以及开除公职和学籍等等，也在学校或者工作单位的集会上遭到“斗争”。但是，在城市的学校和科研单位普遍地召开暴力“斗争会”，在会上用棍棒和铜头皮带打人甚至打死人，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中相当多的资深共产党干部也被指控为“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或“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在“斗争会”上遭到“斗争”。其中有的人，例如曾担任中共辽宁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的韶华（原名周玉铭）在文革中遭到“群众”的暴力“斗争”，回想到他在农村“土改”时，“斗争会”的前一天主持者们商定要在会上由“群众”把谁打死，不知道自己是否也会被列入这样的名单。（见韶华的书《说假话年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在文化界进行这样的“斗争会”，也是这个革命自称为“文化大革命”的原因之一。在韶华的叙述中，我们看到了暴力“斗争会”从农村发展到城市大规模召开的过程。

在时间造成的远距离中，今天我们看得到“斗争会”的来龙去脉。我们也会理解到，对这样一个既非中国传统就有，也非苏联同道所用的怪物，一旦在中国发生，就像一个人身上的脓肿，越来越大，并且有了自身独立的逻辑和需求，同时，祸及越来越多的受难者。

五，为什么“斗争会”流行？

1，毛泽东的“群众专政”

在苏联，没有过中国这样的“斗争会”（另外的区别之一是没有建立过“牛棚”，即设立在每一个工作单位的监狱，用来关押那里的工作人员）。根据现在发布的资料，斯大林在1937

— 38年的大清洗中杀害了数百万人，已经有1,345,796个受难者的名字和资料公布了出来。从数据看，斯大林的杀人方式是：逮捕，然后由苏联法院根据刑法第58条（“反苏维埃罪”）判决死刑或者有期徒刑，被判有期徒刑的人被送往“古拉格群岛”，即“国家劳改总局”建立在遥远地区的大批苦役集中营。相对来说，斯大林的手法是把杀戮和迫害与普通人保持了一定的距离，由专业机构来实施逮捕、监禁和迫害。在地理上，那些苦役集中营在遥远的地方，并不在老百姓的日常视野中。

中国的文革，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主要使用的是“群众专政”的手段。文革也使用死刑和监狱，而判刑的人也大都关在“古拉格”式的“劳改农场”做苦役，但是，文革还实行“群众专政”，即由“群众”而不是由警察来对“阶级敌人”进行“专政”。1967年7—9月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谈话：“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靠政府捉人不是好办法。政府只宜根据群众的要求和协助，捉极少数的人。”。所谓“群众专政”，是相对于用警察、监狱这些“专政手段”来说的。

可以看到，在文革历史上，“斗争会”和“牛棚”作为文革最具特色的两大迫害手段，和“群众专政”的指导思想密切相关。“斗争会”是一种在工作场所和居住区域召开的攻击、侮辱和折磨文革指定的“敌人”的群众大会，“牛棚”则是建立在每个工作单位的关押本单位被“斗争”的“敌人”的监狱，狱卒都是各单位的工作人员。笔者另有专文记载和分析“牛棚”。

毛泽东在1967年这样说了“群众专政”，其实在1966年就这样做了。1966年7月，他指责刘少奇和邓小平把文革搞得“冷冷清清”。在刘邓主持大学和中学的文革的时候，“群众”要有“工作组”（他们已被派在学校取代原来的领导人）的批准才能召开“斗争会”，也不准对“斗争对象”使用暴力。上文写到北京大学1966年6月18日发生暴力事件。1966年8月5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一道文件（该年395号）来撤销刘少奇四十五天前发出的制止北大“乱斗”并重申“斗争人要经过工作组批准”的文件（该年310号）。这可能是文革中发出的最短的文件，全文只有43个字：“中央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日批发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现在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但是这短短一句话引来了全国性的暴力“斗争”高潮。同日，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卞仲耘就在“斗争会”上被活活打死。这是北京市在文革中第一个被红卫兵（可以说是“群众”）打死的人。

有一个关于虐待和折磨的心理学实验是非常著名的。1961年耶鲁大学 Milgram 教授设计的实验中，招募来的实验者掌握一个电击按钮，按按钮就可以处罚在另一个房间里的答错了问题的“学生”，还可以听到学生遭电击后的叫声。实际上，“学生”是假的，叫声是录音，但是受试者不知道这一点。事先人们以为很少有人会继续惩罚受电击的“学生”。可是，实验的结果相反：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受试者听到电击后的“叫声”仍然按照要求按动电击按钮。这个实验揭示了人心深处平常看不到的黑暗。实验报告给人们带来了震动和警示。文革则几乎是对这个实验的真人真境的再现，而且人数和规模无比巨大。经历了文革的中国人很容易理解这个实验，因为他们看到了亿万人在文革中参与了对他人的虐待和折磨的行动。

本文主要陈述了“斗争会”对被“斗争”者的迫害，然而也需要指出“斗争会”对普通人的道德腐蚀。斯大林的安全机构的警察逮捕的，一般是他们不认识的人；在文革中，人们“斗争”那些他们认识的人。在那些几十人，几百人或者一二千人的“斗争会”上，被“斗争”的人和“斗争”人的人，互相认识。在很多情况下，不仅是要人们“斗争”他们认识的人，甚至可以说是“斗争”他们的“熟人”：学生“斗争”老师，工作场所的下级“斗争”上级，儿女“斗争”父母，丈夫“斗争”妻子或者妻子“斗争”丈夫，还有同学“斗争”同学，同事“斗争”同事，邻居“斗争”邻居，等等。因为是“认识的人”，所以人们其实多少了解这些人和他们自己差别不大。可是实际上，他们不但没有帮助这些人，而且还“揭发”这些人，有的还可以说

是“事实”，还有很多是把事情加油添醋，甚至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结果是让被“斗争”者加重罪名，深陷更大的麻烦。

在《文革受难者》书中，可以看到绝大多数受难者都死于他们的工作单位，也就是说，死于他们“认识的人”的手中。以北京大学为例，63名文革受难者中，只有陈信德先生一人死于山西长治的国家监狱中，其他人都死于北京大学校园中或者附近，最远的只是香山（不到十公里远）。而陈信德先生在1969年8月被逮捕进国家监狱之前，已经在北京大学校园遭受迫害三年。他在北大全校师生万人大会上被戴上手铐逮捕。他的“专案组”组长和组员，是他从前的研究生。他的教研室主任非常肯定地告诉笔者：说陈信德是“特务”，完全是昧着良心啊。

有人把文革暴力的原因解释成群众教育程度低，愚昧。但是从上文列举的事实中可以发现，最早在“斗争会”上打死人的，是南京师范学院，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最早的大规模的暴力“斗争”出现在北京大学。最大型和丑恶的“斗争会”是在清华大学开的。这些都是中国教育精英集中的地方，也是远高于全国甚至全世界的平均教育水准的地方。这种解释没有说服力。

我们无从知道，斯大林没有在俄国采用“斗争会”，是因为他没有聪明到想出这一招，还是因为在俄国缺乏召开“斗争会”的“群众基础”。但是应该注意到同在一个意识形态下，同样是大规模迫害人民和进行党内大清洗，为什么有这种手段上的差异？

更直率的问题是：在俄国，是不是不太容易叫那么多人去“斗争”自己的老师、邻居和同事？所以斯大林不能采取“斗争会”这样的形式？所以斯大林要把他的“敌人”送到离开一般人视线的地方去处死或累死饿死？文革时代的人道德水准低，缺乏道德感和自我约束自我反省的能力，他们会积极参与“斗争”别人，包括他们的熟人和同事，甚至把人“斗”残废“斗”死了，也不觉得惭愧或羞耻。

2，对“斗争会”作道德反思

法律 / 犯罪，是评估“斗争会”的角度。道德，也是分析“斗争会”时不能回避的角度。

有一种文学化的说法是：在迫害中，只有两类人。不是受难者，就是暴君及帮凶，不存在“旁观者”。在我看来，这是强调不应旁观罪恶发生的一种修辞性说法。在描写具体的事件如“斗争会”，被“斗争”的人之外，上文把参加者分为两类。一类是“积极”参与的。另一类是“消极”参与的。

文革中那些积极“斗争”文革指定的“敌人”的人，很快得到了官职和权力。文革的赏罚机制非常清楚，分明得超过其他时期。一个典型是上海的徐景贤，1933年生，1963年加入共产党，因为“造反”而从中共上海市委的普通干部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中的第三号权力人物，外号“徐老三”。在文革结束30年后，他在香港发表四十万字的文革回忆录《十年一梦》，其中没有提到任何一个上海在文革中被迫害死的人的名字。而上海有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人在文革中“非正常死亡”。作为文革中新建立的权力机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领导人，上海的“电视斗争会”都是他参与策划指挥的，被判处死刑枪毙的人，如上文写到的在1968年五一节前被枪毙的上海交响乐团指挥陆洪恩，是他签字核准的（当时由省市“革命委员会”批准死刑）。在其回忆录中，对受难者，徐景贤甚至连“表演性”的歉意或同情都没有。

一万多人因为政治迫害而丧生，更多的人受到心理和身体的伤害。对他人的痛苦和血，一般人都会对此多少有恻隐之心。但是文革中那些权力欲望旺盛、没有道德感的人不会同情或怜悯受难者，更不会感到羞愧和歉意。在现实中，徐景贤这样的人不是个别的，而是相当具有代

表性。而且，至今有人为这样的人辩护。说这类人在文革中没有得到物质好处，是理想主义者，总之并不是道德上的坏人。这种说法其实不符合实际。徐景贤的前任是“长征”干部，他文革“造反”一下就得到那个位置，而且文革时代没有别的个人发展或者赚钱的可能，他付出的“机会成本”（经济学上指作别的工作可能获取的好处）是零。他们把迫害人当作了邀功的资本。事情对他那样的人比别人有选择得多，但是他们做了坏的选择。

在调查中还可以发现，那些参与过“斗争会”的普通人，和那些“斗争会”的领导者们很不一样。他们不装腔作势，不故作高深，也不推脱个人责任。他们对“斗争会”的道德题目有所反思。

一位受访者说，他在12岁的时候参与“斗争”了他的班主任老师。他说，他当时心里想到过，如果自己不这样做，也会被“斗争”。他肯定地说，他自己当时不是像有些人文革后说的那样，是因为年幼天真无知才作这种坏事的。他当时是意识到利害关系的，心里做过一个盘算的。尽管是12岁。也就是说，在相当程度上，“斗争”者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的意义和后果，所以使加上应该为这种明确意识到的行为负责任。他相信，比他年长的人更是如此。

一名受访者是湖南人，他说在湖南话里有个说法，叫作“打便宜人”，就是指有场合可以打人，而且不需要担心打了人会被惩罚，不打白不打，把打人当作“占便宜”。“斗争会”上的“斗争”对象，反正已经是“牛鬼蛇神”了，打他们绝对不错，而且还能表现自己“阶级立场”鲜明，对“阶级敌人”仇恨。实际上，“斗争会”就是一个“打便宜人”的好机会。一些女教员被打得特别惨，就因为女老师体力弱好欺负。他认为，那些说自己是因为“革命理想”才打人的人，否认了非常明显的“打便宜人”的流氓心态。

一名受访者文革开始时17岁。笔者在很久以前访问她时，她说她当时就发现，一些凶狠“斗争”别人的人，有心理需要。她观察到班里的一名红卫兵，父亲是高级军官，是家里三个孩子中的老二，上面有姐姐是老大，下面有老三是男孩，她是女孩又是老二，是家里三个孩子中不受宠的。这个人文革前喜欢大呼小叫显示娇气，文革中打人又凶狠得很突出。这名受访者认为是因为那种要得到关注的潜意识中的欲望起了重要作用，从娇气到凶狠并不矛盾。17岁的高中生实际上已经有相当的观察和分析能力，虽然也许还没有读过系统的心理学理论。

在上文已经写到了把“斗争会”当作看热闹的好机会的中学生。相当明显，年轻人，文革中被报纸和“首长讲话”称为“革命小将”的，在文革“斗争会”上扮演过活跃的角色。他们加入“红卫兵”和“造反派”组织，起过类似“希特勒青年”在迫害犹太人中扮演的角色的作用。年轻人因为年轻，缺乏长远眼光，不知道今天施加于别人身上的迫害，将来会“报应”到自己和家人身上。年轻人心智不成熟，道德原则未完全养成，缺少反省能力，易被操纵。翻开1966年8月到12月的《人民日报》，看到大批大幅照片上，在天安门城楼上，在文革领导人身边，欢呼雀跃的，大多数都是中学红卫兵。后来的柬埔寨“红色高棉”也一样，利用十多岁的少年兵进行屠杀和毁灭文明。反省文革历史，不需要做心理学实验，我们也会对青少年的道德成长过程有更明晰的认识。

2010年，北京外国语学校的八名前红卫兵写信向被他们“斗争”过的校长程璧道歉。笔者为此写了《红卫兵道歉》一文。在报纸发表后，编辑告知说，一天就收到了750个读者来信。这显示了“道歉”是一个很多人关心的主题。也就是说，关于文革的道德思考，并没有在人心熄灭。

3，“斗争会”文化遗产

在俄国小说中对斯大林大恐怖时代人们的道德选择作过相当多的探索。例如在《滨河街公寓》中，写到一个研究生在其导师刚开始被指控为反革命时，他得到了祖父去世的电报，喜出望外，借参加祖父葬礼立即请假回家而离开了学校，等他回到学校的时候，导师已经被带走不见了，他积极跟上形势，很快取代了导师的学术位置。这个研究生至少有过比较痛苦的内心矛盾，而且俄国作家也认为这是值得描写的。然而，《滨河街公寓》和其他俄国小说里的这种道德探索和心理活动描写在中国文革后的文学中似乎没有出现。

在中国文学界还出现了相反的情况。上文写到北京大学在1969年8月接连召开两个全校大会，在会上当众给两名教员戴上手铐塞进吉普车逮走。其中一人是中文系教授章廷谦（1901—1981）。哲学系教授冯友兰“揭发”章廷谦是西南联大的国民党区分部委员。他不承认。（此事后来也查明确实没有。）那时执掌北大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东操场召开全校性“宽严大会”，在北大一万师生面前，宣布对章实行“抗拒从严”，“戴上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当场把他铐上手铐，塞进了准备好的停在场边的吉普车。在那期间，他的妻子孙斐君突然脑溢血瘫痪并神志不清，大学毕业不久的小儿子自杀。在手铐和“戴帽子”的高压下，北京大学一大批教员职工被迫承认强加给他们的罪名。比如中文系音韵学教授林焘被迫承认要炸北大水塔。

29年以后发生的事情令人吃惊。不是受害者追究加害者，反而是作家宗璞（冯友兰的女儿）要求学者钱钟书先生道歉，因为钱先生1979年访问斯坦福大学谈话提到文革中冯友兰害了章廷谦一家。当时钱钟书已经病重住院（不久就去世了），宗璞的丈夫拿了一张写好的字据，到钱钟书家中要夫人杨绛签字，又到章廷谦长女章淹家要其签字，要他们承认钱钟书造谣，还扬言要到法院控告。一些报纸刊登了长篇消息，有一篇文章的标题是“为了大师的荣誉”。

在这场争论的话语系统中，最让人感到不安的是一项道德缺失：章廷谦一家的悲惨遭遇，北京大学一大批教员在1969年所受的迫害，包括前面写到了林焘教授在大会上看到同事被铐上手铐带走后被迫承认自己要炸未名湖边的水塔的经历，都被忽略不提。

迫害和苦难，在这里成为历史“盲点”，实际上是由于这先已成为道德“盲点”。1969年宗璞已经40多岁，显然了解文革历史。对她来说，这是一个用什么道德观念来判断是非的问题。而年轻的记者们并不知道在北京大学有过这样的大会上用手铐把教授铐走的事情。历史被遗忘和道德被扭曲两相结合，才出现了做坏事的人不道歉不羞愧，反而向说出真相的人进攻的情景。这个事件，可以算作“斗争会”文化遗产中令人瞠目的一个。

所谓“知识分子”，其实，既不是文革中被说成的“狗屎堆”一样的人物，也不是文革后有些小说里描写的坚强不屈的英雄。人的身体会在铜头皮带和拳头棍棒下受伤，在精神和道德方面也是一样。人都是有弱点的，“知识分子”也不例外。尤其是在文革这样的大规模迫害和虐待中，“知识分子”的脆弱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把人锻炼成刀枪不入是不可能的事情，可行的是通过历史学习真理，建立起一个不需要人用肉身来抵御专制刀枪的制度。

文革过去之后的社会状况，使得一直有人在议论中国的道德危机、诚信危机等等。究竟是文革“斗争会”（以及其他迫害手段）使得人们道德水平低下，还是道德水平低下导致了“斗争会”可以在中国大行其道十年？回顾文革“斗争会”场景，可以看出双方面互动互促的关系。这是一个非常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题目。这一讨论不但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也有助于我们深化自我认识及提升道德。

本文描述和分析了“斗争会”的恐怖和黑暗，然而，同时也试图记忆那些经受了“斗争会”的迫害和虐待但是从来没有放弃内心的道德和价值观的人，并赞扬那些那些在艰难的时代帮助过被“斗争”的人的人。例如，本文说到的两名曾经假装“生病”逃避参加“斗争”的人，以

及在北京大学的大规模“游斗”中帮助了被打掉眼镜的老师的朱德熙先生。笔者也深深感谢在提供本文资料时也忏悔了自己当年参与“斗争会”的多位受访者。善行应该被记住。黑暗中的火花会照耀我们的精神世界。

最后，笔者希望本文能在“斗争会”研究方面起开头的作用，更希望“斗争会”会像疾病天花一样将只存在于历史书中或标本室里，而在人类实际生活中绝迹。

（全文完）

本期编辑：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CND》总编：
华新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华夏文摘》网址： http://www.cnd.org/ ，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